

## 试析 1968 年美国天主教会内部的“生命权”问题之争

张小龙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关键词] 梵蒂冈; 天主教; 控制生育; 宗教保守主义

[摘要] 围绕罗马教皇在 1968 年发布的《人类生命》通谕是否具有合理性问题, 美国天主教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 教会上层保守派一方的意见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而在伦理道德领域确立了美国天主教会延续至今的宗教保守主义立场。教会从此成为反对人工控制生育的中坚力量。其保守立场成为天主教会同其他教派, 尤其是新基督教右翼派别的合作基础。

[中图分类号]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6)02-0082-05

## An Analysis of the Conflict over Right-to-life Issue within the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in 1968

ZHANG Xiao-l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China)

Key Words: Vatican; Catholicism; birth control; religious conservatism

Abstract: "Humanae Vitae" encyclical issued by Pope Paul VI in 1968 led to sharp conflict concerning its reliability within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Archconservative opinions took the lead at last. The Church has been ethically conservative and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battle against birth control since then. Catholic conservatism also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ainline denominations, especially the New Christian Right ones.

本文中所提到的“生命权”问题, 是指围绕社会成员是否有权以人工手段阻止、限制或有计划控制人类生命的自然诞生而形成的伦理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宗教, 其终极意义在于生命价值观的界定。在美国, 生命权问题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始于 1973 年最高法院“罗伊诉韦德案”裁决, 并由此形成了重生命(Pro-life)和重个人选择(Pro-choice)两大对立的社会阵营。但就天主教界而言, 争论早在 1968 年就已展开, 并以保守主义势力占据上风而告一段落。本文拟以 1968 年的“生命权”问题之争入手, 通过对其影响和后果的考察, 来揭示美国天主教会宗教保守主义立场的形成原因及实质。

### 一 《人类生命》通谕的背景及影响

天主教对于人工控制生育行为的反对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 4 世纪, 基督教会就曾对堕胎行为给以谴责, 教界人士从《圣经》出发, 认为“孳生繁育”是上帝自亚当夏娃时代就已赋予全体人类的神圣使命, 故而堕胎不仅有违人道, 而且严重背离上帝的意志, 无异于谋杀行为。此外, 对生育行为加以任何人为的控制也是“上帝眼中看

着为恶”的罪行,<sup>[1](p353)</sup> 因而是应予谴责的。然而, 自文艺复兴以来, 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伦理学不断受到人本主义思想的冲击。一方面, 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是自身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主体, 人可以为自己确立道德原则并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人本主义思想提供了科学佐证, 对于人在出生前就已是具有完全生命和灵魂的行为主体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进入 20 世纪, 现代医学手段已使安全堕胎和避孕成为可能。关于控制生育的争论开始越出医学界领域, 引发了更多的深入思考。到 20 世纪中期, 围绕控制生育问题已形成了“重生命”和“重选择”两种对立的观点。

“重选择”派是现代入本主义思潮的产物, 以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为主要出发点, 并得到新兴女权主义运动的有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 “重选择”派同样借助于宗教来阐发自己的主张, 注重从神学领域和宗教历史文献中寻找依据, 论述控制生育行为的可行性。如著名神学家汉斯·昆的“归纳神学”方法论就一再为主张堕胎合法化者所借用。<sup>[2](p79)</sup> 因此, “重选择”派在天主教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中也有

着相当的影响力。在当代基督教日益走向多元化、开放化的时代,生育伦理已逐渐成为教界内部所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为维护传统道德伦理而努力已经提上教廷的日程。

1968年7月25日,教皇保罗六世发布了《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通谕。通谕的副标题为《论人类繁衍后代的正确秩序》。教皇在文中引述了自中世纪以来教会在生命权问题上的传统说教,对堕胎、绝育手术和其他人工控制生育行为“不加区别地”给予谴责。此举招致教界内外的强烈反响,掀起了一场广泛的神学争论。

《人类生命》通谕在内容上本无新意,但若考虑到它出台的动机与经过,就显得意义非常。教廷自1962年梵蒂冈第二届大会会议(简称“梵二”会议)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在保守与现代上何去何从的问题。在“梵二”会议提出“与时俱进”号召后,革新浪潮给天主教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教会官方权威的挑战、对教徒个人权益的肯定,以及道德伦理问题上的世俗化倾向。

但革新并非教廷内部的一致意见,不少人担心教会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得太远,同时会使教廷失去原有的约束力和权威。在整个60年代,世界天主教界内部最敏感的两个问题,一是生育伦理问题,二是教皇的无谬误性是否还适用于“梵二”会议后的天主教界。保罗六世认为,后者涉及教皇个人权威,不宜公开讨论,但却决心在“生命权”问题上树立教会的威信。

早在“梵二”会议期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就曾组织过一个由各国神学家和社会学学者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其目的是考察人口压力给世界带来的后果。保罗六世于次年即位后,又督促该委员会将婚姻和性伦理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并称研究报告将在近期公之于众,但同时发表谈话称:“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庇护十二世以来教廷在这一问题(生育伦理)上的论述已不合时宜,失去效力,必须承认这一训谕的有效性,至少现在我们没有做出改变的意愿。”<sup>[2](p126)</sup>改革派认为,教皇的言论有违约翰二十三世鼓励自由“讨论”的原意,有复旧和倒退的意图。其间,委员会进行过多次讨论,多数学者认同改革派在婚姻和生育问题上的观点,但最后的研究报告却在1967年才公之于众,完全由委员会内部的少数保守派执笔,仍然支持“迄今为止教会一贯所宣传的正确教导”。次年7月,教皇在“深入参考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后发布了《人类生命》通谕,对改革派的

惟一让步是没有将该通谕列入“无谬误”文件之列,也就是说,教廷允许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一定范围的争议。<sup>[3](p398)</sup>

从《人类生命》通谕诞生的前前后后来看,其意义决不仅限于伦理学范畴,它反映的实际上是教会内部新旧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的较量。“梵二”会议对协商性、责任性和宽容性的强调,在上述过程中至少从形式上得以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俗意义上的民主协商原则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参考,但协商与民主仍是以不触及教会权威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表明,教皇沿袭了自古以来历任教皇借阐释教义来维护个人权威的做法,他所担忧的是“从圣彼得那里继承的卫护和注释教义的权力”会在现代主义运动面前不断被消解,以致使自己成为一位有名无实的宗教领袖。<sup>[4](p15)</sup>保罗六世在1968年7月31日的一次讲话中辩称自己的做法主要是出于“维护基督教婚姻神圣性的考虑”,并试图体现“对已婚者的关爱和宗教情感”<sup>[5](p77~78)</sup>,但相当多的自由派人士仍深感受到伤害。教廷传信部在8月呈给教皇的一份报告中,将当月称为“神学界的愤怒之月”<sup>[6](p196)</sup>。教皇受到的压力,对于美国天主教界的高层神职人员也同样存在。教皇《人类生命》通谕的颁布,对美国教会内部的自由派人士是一次打击,也为保守派教会领导人提供了重树教会威信、消除思想分歧的机会。

## 二 美国天主教会内部的“生命权”之争

美国天主教会最早曾在1919年以公开信的形式对避孕行为进行谴责。1921年11月14日,纽约大主教海斯授意布鲁克林区警方驱散了正在当地举行的美国第一届控制生育会议,并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称“剥夺业已出生的生命已属重罪,而阻止上帝造就生命就是魔鬼般的行为”<sup>[5](p235)</sup>。从事后的反映来看,新闻媒体多数只表达了对天主教会任意操纵“城市政治机器”的不满,而对大主教的声明没有任何异议,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整体趋向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即使想在教内就“生命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也是不可能的。

《人类生命》通谕的发布激化了美国天主教会内部本已存在的对立情绪。1968年9月,以约翰·克里根神父为首的44名自由派教士通过《华盛顿邮报》首先对教皇的通谕发难,称个人的选择权利必须得到尊重,教会官方立刻做出回应,保守

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奥伯伊尔红衣主教立刻召见克里根等人,要求他们就其言论做出解释,对 44 人中态度激烈的 13 人予以撤销教职处分,并于 23 日上午亲自在圣马修大教堂宣读公开信,指责克里根为“伪先知”,号召信徒服从保罗六世的训谕,不要受“虚假的自由观念”所蛊惑,否则“上帝将从天国的名册中勾销他们的名字”。<sup>[2](p88)</sup> 红衣主教的观点得到了部分保守派团体如“团结在信仰周围之天主教徒”的支持;在中西部的部分教区,教会仿效奥伯伊尔的做法,将一些反对教皇通谕的教士和学者逐出神学院。然而,支持自由派者也不乏其人。抗议很快从华盛顿发展到其他地区。据事后统计,全美国共有 317 名教士在各自讲坛表达对《人类生命》通谕的质疑,其中纽约、底特律、巴尔的摩等地的教士曾以团体公开信方式表达自己的反对心声,运动甚至得到了欧洲神学界的支持,二十多名神学家在阿姆斯特丹集会,对美国自由派人士表示声援。

冲突很快显示出自下而上的特征。圣母大学的部分神学家提出“神学必须自由”的观点,论述教皇在教义解释上的专断做法是教会的灾难。全国性的教士组织“美国教士联盟会议”也于 9 月 24 日发表声明,指出“教会当前应特别关注人权和正义方面的内容,现行的教法是不足以卫护人权的,教会法规一定要服务人本身”。由教士和信徒组成的“美国教区革新协会”则称,对持异议教士的处罚是“不适当、不符合教义并且不可容忍的”。“华盛顿教士联盟”甚至一度要求奥伯伊尔退休,以结束僵持局面,<sup>[2](p89)</sup> 但教会领导人的立场却没有任何动摇。冲突到 10 月中旬为止渐趋明朗化,各地教会对于持异议者采取的压制措施逐渐收到成效,随着许多激进教士被革除教职,克里根等人失去舆论上的声援。11 月 13 日,天主教主教团全国会议(National Catholic Conference of Bishops, 简称 NCCB)宣布,华盛顿的持异议者已接受了它的调解,为期近两个月的冲突以保守派的胜利告终。事后仍有部分教士坚持向教廷上诉,但毫无结果。

围绕《人类生命》通谕的争端是美国天主教会历史上最激烈的内部冲突。在一贯强调集中和统一的天主教会中,出现如此激烈的对立是值得关注的。保守派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但许多人认为,这场冲突更像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零和游戏,双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只是暂时缓和而已。就冲突的性质而论,它是美国天主教会内部矛盾,

尤其是教会领导层与下层神职人员之间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古老的天主教信仰在美国土地上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已在相当程度上吸纳了自由、平等及个人自决等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梵二”会议鼓励中下层教士与平信徒参与教务的做法,进一步调动了下层教士的积极性,对于教会官方决定私下或公开提出质疑的举动在这一阶段常有发生。据统计,在 1965 年 12 月至 1971 年 3 月期间,全美国就有 22% 的主教辖区发生过下层教士以公开信抗议教会官方决议的事件,30% 的主教辖区曾有教士在布道中鼓励信徒“造反”,38% 的主教曾抱怨教士拒不服从上级规定,更有 95% 的主教收到过表达反对意见的信函。<sup>[6](p176)</sup> 主教权力过于集中,教士意见得不到重视,上层决定与教区具体实际情况有所冲突,都是问题的焦点所在。而家长式管理作风则是最令下层教士不满的因素。这一点在这场冲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华盛顿的持异议者在公开信中写道“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但我们不是小孩子”,教士们同时还起草了一份《教会基层社区权力法案》,要求 NCCB 给予审核。而在教会上层方面,天主教利益集团自 20 世纪初以来整合并控制了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大量资源,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强,教会领导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在他们看来,教会之所以能在以新教徒为主体的美国社会中成长壮大,是与其原则性和组织性分不开的。对于来自下层的声音,许多主教持消极态度,而在生命权问题上,教会上层出于维护自身权威的考虑,坚持寸步不让,在这一点上,美国天主教会上层与教廷的出发点是一致的。NCCB 对于保罗六世的决定予以毫无保留的支持,称其“符合根植于东西方基督教信仰中的道德信念”<sup>[2](p80)</sup>。

冲突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后果是平信徒对教会传统上的依赖性有所降低,其自决意识得到强化。社会学家 A·格里利曾用“分裂”一词来概括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的基本特征。<sup>[2](p82)</sup> 格里利的这一说法并不为过。同这一时期的黑人民权运动、反主流等文化运动相比,天主教会内部的这次冲突不具有普遍的影响力,但它对于传统的信仰秩序仍是一次冲击。天主教徒世代接受的信仰由于教会内部的分歧而出现松动,相当多的信徒对教会上层采取的强制手段并不认同,仅在红衣主教宣读其公开信的两个小时中,就先后有近两百人退场。70 年代和后来的统计结果显示:天主教徒仍是美国社会中思想价值观念趋于保守的团

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背教人数在这一时期明显上升,而教堂上座率则逐年下降。据盖洛普的统计,在被问及背教理由时,39%的背教者归因于教会领导者思想僵化、宗教生活沉闷无趣,25%的背教者则称自己无法接受教皇和教会官方规定的生活方式。<sup>[7]</sup>冲突的影响在教堂上座人数的统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各教区的教堂上座率自1962年亦即“梵二”会议召开的开始上升,但自1968年之后却下降了近百分之五十。<sup>[4](p141)</sup>另据美国天主大学研究人员的统计,较少或基本不去教堂者中有60%不同意教皇《人类生命》通谕中的观点,75%的人在“生命权”问题上持自由态度,即使在仍与教会保持密切联系的教徒中,仍有59%的人认为要做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不一定非要遵循教皇的说教。<sup>[8](p9)</sup>随着天主教徒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信徒更倾向于采取所谓“第三方”的姿态来对待教会内部的矛盾,即坚持对基督的信仰,但不接受教会训谕中陈腐过时的说教,也不为激进派的言论所左右,而是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凭借个人的实践经验做出道德判断。<sup>[9](p151~155)</sup>

### 三 天主教会保守主义生命价值观的形成与社会实践

1968年冲突仅仅是“生命权”与“选择权”的初次交锋。从长远来看,由于自由派的观点受到压制,教会上层的道德神学观念和反智主义传统得到空前加强,并由此逐步形成了美国天主教独有的生育伦理观和生命道德观。在整个6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在社会立法领域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到1969年为止,共有14个州修改了原有的习惯法,对主张堕胎合法化者给予有限让步。因此,教会很快将注意力投向了社会立法领域。自1969年起,NCCB连续5年发表维护“生命权”的声明;在1970年4月的一份声明中,NCCB对“一系列倾向激进的转变,以及企图完全废止现行法律的举动”表示忧虑,并在文末宣称:“我们无意将自身的伦理观作为社会政策的唯一出发点,但我们表达的愿望,相信是其他信仰的人士,以及医疗、法律、社会科学等领域专家共同关注的焦点。”<sup>[10](p171)</sup>以上言论表明:争取社会范围内的支持,尤其是与基要主义、福音主义与道德多数派等新基督教右翼派别结成联盟,已成为教会领导人的现实要求。

从内容上讲,天主教保守派与新教基要派、福

音派的生命价值观并无大的差别,但在理论依据和行为动机上却有所不同。从神学角度来理解,基要派强调生命本身的神圣性,倾向于将堕胎看做反自然的行为,一般不拒绝在论战中使用科学发现作为论据,而天主教徒则从维护三位一体神学要义出发,即上帝(圣父)、耶稣(圣子)和道(圣灵)同为一体,同人的灵魂相联系,并以此来拯救人类。受孕并非只是生命的开始,更是人类灵魂与肉体结合之时,倘若阻断这种结合,灵魂将无从得救,因此天主教界在宣传中经常使用“拯救灵魂”而不是“拯救生命”的口号。<sup>[11](p202)</sup>在伦理道德方面,基要派和福音派是清教徒传统的基督教伦理观,也是美国人特有的选民观的产物,它们在维护基督信仰的同时,服务于“美国事业”的目的非常明确。如基要派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道德败坏,人心离散,宗教情感淡漠,亟需一次宗教领域的复兴运动。反堕胎运动是这场“纯化美国”运动的一部分。天主教则认为:有稳定的家庭和社区,才会有稳定的价值观念,而这些正是天主教信仰在传承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更倾向于从维护传统信仰的角度出发,以动员本教力量为主。上述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双方在“生命权”问题上往往是求同存异的。如新基督教右翼的“基督教联盟”声称:在社会道德问题上不应搞关门主义,只要意见一致就可合作,而天主教名下的反堕胎组织如“全国生存权组织”、“保护生命大会委员会”等同样不限定宗教信仰,许多福音派和基要派成员也参与其中。<sup>[12](p207)</sup>

联邦最高法院于1973年对“罗伊诉韦德案”做出的裁决被美国天主教会看做是自己的一次重大失利。NCCB的主席科洛尔称,法院肯定堕胎权的举动是“难以言状的全民性悲剧”<sup>[10](p171)</sup>。教会认识到,只有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经济资源,仿效其他利益集团建立游说组织,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政治愿望。对此,天主教界做出的反应主要有二:首先,NCCB策划成立了“全国争取维护人类生命修正案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Human Life Amendment)这一院外活动组织。该组织致力于团结不同信仰的人士,促使国会通过肯定“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修正案,以此抵消最高法院判决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由科洛尔等4位红衣主教亲自出面,对参议院下属的一个宪法修正案委员会进行游说。<sup>[10](p172)</sup>在此过程中,天主教会逐渐不满足于把问题仅仅集中在“生命权”领域,而是试图在更广

泛的社会问题上施加自己的影响。

NCCB在1975年11月公布的《维护生命权行动教务计划》被称为美国主教阶层有史以来目的最明确、态度最大胆的社会宣言。该计划首次提出：国家应在公立学校教材中增加关于生命神圣性的内容，强调生命权应高于其他一切权利，包括个人的选择权。更值得注意的是，“生命权”的外延在这份计划中首次被扩大到生命的各个阶段。这一点在它的起草人伯纳丁(Joseph Bernardin)红衣主教后来的讲话中得到了确认。伯纳丁强调：反对堕胎仍是教会当前的第一要务，但同时又表示：“如果这一计划没有及时公之于众，我国的主教们将面临指责，被认为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而完全无视其他问题……教会重生命的立场，必须通过既有多样性又有一致性的各项事业表现出来。”在他看来，应关注的“其他问题”至少应包括死刑存废问题、核武器与现代战争问题以及就业问题，此外还表达了对政府现行外交政策的不满，反对美国向中美洲各国军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因为这些政府均有不同程度的反人类罪行。<sup>[2](p90)</sup>伯纳丁强调，天主教徒和其他“有正义感的人”在这些问题上应立场一致，遵循“一以贯之的生命伦理”。他用“无缝外套”(seamless garment)一词来形容这种一致性。<sup>[4](p125)</sup>一般认为，做出这一修正旨在争取本教信徒的支持。据盖洛普年度测验结果，在1968~1980年间，将“道德水准滑坡”列为首要社会问题的天主教徒平均只有2%，最多时也不过4%；而新教徒中有4.8%的人选择了这一问题，最多时达到9%。可见，天主教徒的保守程度并没有其主教阶层那样强烈。因此，适时扩大“生命权”的涵盖范围，将目光投向核武器及民生等平信徒更为关注的问题是必要的。<sup>[2](p90)</sup>从中可以看出，天主教保守主义价值观

在社会政治领域注重实际效用的一面，实用主义原则同样也体现在天主教会的行为方式中。<sup>[10](p175)</sup>

#### 参考文献：

- [1]圣经[Z].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96.
- [2]John Seidler, Katherine Meyer. *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Catholic Church*[M]. Rutgers, 1989.
- [3]William Carey. *The Roman Catholics* [M]. Connecticut, 1993.
- [4]Richard Gelm. *Politics and Religious Authority: American Catholics since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M]. Connecticut, 1994.
- [5]John Mahoney. *The Making of Moral Theology: A Study of the Roman Catholic Tradition* [M]. Oxford, Clarendon, 1987.
- [6]George Gallup, James Castelli. *The American Catholic People: Their Beliefs, Practices, and Values*[M]. New York, 1987.
- [7]Bromey David. *Falling From the Faith: Causes and Consequence of Religious Apostasy* [M]. California, 1988.
- [8]Charles Morris. *The American Catholics: the Saints and Sinners Who Built the most Powerful Church*[M]. New York, 1997.
- [9]Timothy Byrnes. *Catholic Bishops in American Politic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1991.
- [10]Karl Roche. *The Catholic Revolution* [M]. New York, 1997.
- [11]Simon Mize, William Portier. *American Catholic Traditions: Resources for Renewal* [M]. New York, 1997.
- [12]Robert Fowler.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n* [M]. New Jersey, 1985.

收稿日期 2005-08-30

作者张小龙，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池 豫】

# 试析1968年美国天主教会内部的“生命权”问题之争

作者: 张小龙, ZHANG Xiao-long  
作者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刊名: 史学月刊 PKU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年, 卷(期): 2006, "" (2)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12条)

1. [圣经](#) 1996
2. [John Seidler, Katherine Meyer 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Catholic Church](#) 1989
3. [William Carey The Roman Catholics Connecticut](#) 1993
4. [Richard Gelm Politics and Religious Authority: American Catholics since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94
5. [John Mahoney The Making of Moral Theology: A Study of the Roman Catholic Tradition](#) 1987
6. [George Gallup, James Castelli The American Catholic People: Their Beliefs, Practices, and Values](#) 1987
7. [Bromey David Falling From the Faith: Causes and Consequence of Religious Apostasy](#) 1988
8. [Charles Morris The American Catholics: the Saints and Sinners Who Built the most Powerful Church](#) 1997
9. [Timothy Byrnes Catholic Bishops in American Politics](#) 1991
10. [Karl Roche The Catholic Revolution](#) 1997
11. [Simon Mize, William Portier American Catholic Traditions: Resources for Renewal](#) 1997
12. [Robert Fowler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n](#) 1985

##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张寿奇 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与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 - 黑龙江史志](#) 2009, "" (10)  
天主教在美国有着不一样的坎坷历程, 直到20世纪中期才被美国社会接纳并发展壮大起来, 其社会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 本文主要就当时的美国社会政治等原因剖析时局, 以及这种时局下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会议, 对二十世纪中后期美国天主教在美国的演变做一个分析, 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是天主教在美国发展的一个契机, 它从多方面把天主教中不适合美国社会政治的因素淡去了, 因而意义非常重大。
2. 期刊论文 [天主教的圣地——梵蒂冈 - 地图](#) 2008, "" (1)  
梵蒂冈城国(The Vatican City state), 简称梵蒂冈,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方台伯河西岸, 以四周城墙为国界, 从罗马踏进圣彼得广场就算进入梵蒂冈的国境了。虽然此“城中之国”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 但是这实体最小的国家, 却是虚拟世界力量最大的国家, 影响力毫不逊色于世界大国。因为此地就是全球10亿多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 天主教教廷所在地, 天主教的教宗—教皇也居住在此。
3. 期刊论文 [刘珂, Liu Ke 从《窄门》到《梵蒂冈地窖》看纪德对基督教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 国外文学](#) 2006, "" (3)  
本文通过介绍纪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文坛“天主教复兴”大环境中的思想发展轨迹, 对作家复杂的宗教态度的形成过程与基本特征进行梳理和总结, 并通过对纪德的两部作品《窄门》和《梵蒂冈地窖》的阅读分析, 从两个方面探讨纪德对基督教问题的批评思考: 对新教的隐晦批评和对天主教的辛辣讽刺; 考察了这种批评态度下隐藏的人本主义思想。
4. 学位论文 [张媚 战后台湾天主教研究 \(1949-2000年\)](#) 2004  
台湾天主教是台湾地区一个具有国际背景的宗教团体, 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从国民党逃往台湾后迄今五十年里, 天主教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发展阶段, 其与台湾当局、与梵蒂冈的关系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该文从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多学科, 多角度审视和分析了台湾天主教由成长壮大到停滞衰弱的发展历程, 剖析了其台湾当局、梵蒂冈的关系, 详细介绍并分析了它的组织机构及社会服务事业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5. 期刊论文 [朱丽明, ZHU Li-ming 天主教徒生活的多面镜——谈戴维·洛奇的《灵与肉》 -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 (1)  
戴维·洛奇的小说《灵与肉》描写的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及Humanae Vitae发表以后, 天主教徒如何重新审视权威与良心, 如何经历着各种改革, 最后又如何选择了一位保守派新主教的故事。本文以《灵与肉》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作品中天主教徒的共性和个性的发掘, 认为《灵与肉》这部作品就像是天主教徒生活的多面镜, 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天主教内部的状况, 是英国天主教那个徘徊时期的一个缩影。
6. 期刊论文 [梵蒂冈城 - 广西城镇建设](#) 2006, "" (12)  
梵蒂冈城是天主教最神圣的地方, 具有巨大的历史和精神上的意义。梵蒂冈城内保存着大量的珍贵文物、写本、图典和艺术精品, 另有许多不同时期的建筑, 主要的有著名的西斯廷教堂和使徒圣保罗的墓地等。梵蒂冈城位于罗马城西北部, 台伯河右岸。梵蒂冈的国土大约有40公顷, 是目前世界

上最小的独立主权国家。

7. 期刊论文 张林初 [艺术殿堂梵蒂冈](#) -[世界文化](#)2008, "" (10)

意大利之行虽然匆忙,但不能不去位于罗马西北角的袖珍国梵蒂冈,它的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人口仅684人。我们参观完罗马斗兽场后驱车直接去梵蒂冈,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但却看不到明显的国界,我们便随着人群排队去参观圣彼得得教堂。梵蒂冈虽小,但每年吸引上百万游客前来参观游览,除了它是世界天主教中心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不少艺术杰作。

8. 期刊论文 张西平. [Zhang Xiping 梵蒂冈图书馆藏白晋读《易经》文献初探](#) -[文献](#)2003, "" (3)

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是世界上稿本最多的图书馆,也是藏明清间天主教文献最多的图书馆之一,近百年来已有不少前辈和同代学者到此探宝并对这批文献做了一些研究。①

9. 学位论文 朱丽明 [《灵与肉》中天主教徒的共性与个性](#) 2005

戴维·洛奇的小说《灵与肉》描写的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及Humanae vitae发表以后,天主教徒如何重新审视权威与良心,如何经历着各种改革,最后又如何选择了一位保守派新主教的故事。本文以《灵与肉》为研究对象,对洛奇的这部描写天主教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灵与肉》这部小说全方位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天主教内部改革对天主教徒产生的巨大影响。指出社会背景和天主教内部的主要问题密不可分,小说中的人物面临许多共性问题,如:信仰危机和避孕等。同时将作品中十个主人公作为独立的线索,认为作者通过笔下众多的人物深入到天主教内部发掘不同人群特点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创作手法。总之,本文通过对作品中天主教徒的共性和个性的发掘,认为《灵与肉》这部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天主教内部的状况,是英国天主教那个徘徊时期的一个缩影。

10. 期刊论文 徐力源, 曾强. [Xu Liyuan, Zeng Qiang 罗马天主教中的传统主义](#) -[国际资料信息](#)2005, "" (11)

1962-1965年期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以下简称“梵二”)导致罗马天主教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传统主义者指责教廷“变节”和“不公正”,已向“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投降,并且正在“摧毁”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传统主义的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对抗常常被媒体描绘成一个旨在挽救“旧弥撒”的怀旧运动。①尽管媒体如此轻描淡写,但事实上这一冲突的性质复杂且深刻—既是对“梵二”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挑战,也是对定义天主教性质的权力和权威的挑战。同时,“传统主义”也是一种抗议,抗议天主教迷失自己的认同,丧失了自己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主导权。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xyk200602011.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xyk20060201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0d57e3db-fc6a-4394-9690-9e4d007f83fc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